

先秦文體分類與古代文章分類學

趙 達 夫

先秦散文歷來為學者們所重視，對后代文章影響甚大。從研究方面說，專從哲學，政治，歷史等社會科學方面研究的論著拋開不說，只解讀，評析方面的論著也是汗牛充棟。可以說歷來有關先秦諸子，先秦史傳方面的論著都是有關先秦散文的。但先秦散文的研究還有待拓寬領域和進一步深化。我認為應從吾個方面入手：一，文獻學方面的研究(包括地下出土先秦文獻及由之引起的對先秦散文著作真偽，創作時代的重新審視，篇章的分合，作者的歸屬，文獻學的處理等)；二，斷代的研究(如對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散文的狀況分別加以研究)；三，文體學研究；四，地域特征的研究(如中原，齊魯，南楚，秦地等地文章的文風特征等)；五，流派研究(先秦諸子的文風表現出各自獨特的風格，故儒，道，墨，法等不僅是思想的流派，也是散文的流派)。其他問題暫且不談，這里說說先秦時代的文體分類與當時人們對文體的認識，順便談談我國古代的文章分類學。

個民族的各種文章(包括應用文和文學作品)不僅其內容反映了該民族的歷史，文化，其形式也帶有民族的特征。文體是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反映着一個社會的文化狀況。但每一個時代的文體都是由過去的文體發展演變而來的，有變革，也有繼承。固然，建立科學的文體學，提出能反映我國文體實際，又具有現代科學性的文體分類辦法，既要對當前的文體發展情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也要對國外文章分類方面的研究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同時還得弄清我國古代文章分類的發展過程和有關理論。這些工作不走在前面，就很難有實質性的突破與建樹。

關於古代文體分類，近十多年已有研究的論著問世，如諸斌杰先生的《中國古代文體概論》。

文章不同形式，不同體裁的形成，是很早的。文字產生以前已有祭祀，有氏族，部落的會議，氏族，部落的首領常常發布命令，或就某些事情作訓告。于是禱辭和訓告，命令等語言形式便產生。與此同時，神話故事，傳說，歌謠，作為早期自然科學知識結晶

和社會禮俗成規的諺語也都產生。這些言辭因為使用場合與使用對象的不同，從形式到語言風格上都會有所不同，這便形成了不同的“文體”，只是，因為它們不是用文字固定下來的，還不能算是文章；其形式也只能說是約定俗成的表述方式，還不能說是“文體”。它們除歌，謠，諺以及韻文形式的祭禱之辭(如傳為伊耆氏的《蠛辭》)可能長期的口耳相傳，至文字產生之後被著之竹帛，其他的便淹沒或慢慢變形，甚至加進了后代的東西(屬於后一種情況的如《尚書·堯典》)。雖然由口頭到最早的書面語，被刪除的必然很多，但后來的所謂“文章”便從這里產生。隨着人們創造的文字數目的增多，文字對語言的記錄功能的增強，各種文章便產生了，各種文體也隨之產生。

我國古代關於文體的認識也是很早的。《尚書》中不少文章的篇名，實際上是在文體名前面加了作者的名號(也有的只以作者名號為題，個別的取篇中几字為題，乃后人所擬)。這同《尚書》這部書取名的情形是一致的。《尚書》中的文體名稱有“典”，“謨”，“誓”，“誥”，“訓”，“命”。¹⁾又《國語·魯語》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頌”是相對於民歌(“風”)和貴族，文人的一般抒情，諷刺之作(“雅”)而言的，不僅在內容上，在形式上也有其特征。由《國語》中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在商代已將這些體裁相同的作品集結起來被名之為“頌”。《逸周書》，《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等書中，也存有不少先秦時不同體裁的文章，宋代陳棣的《文則》總結《左氏春秋》中的文體有八種：

考諸《左氏》，摘其英華，別為八體，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當(《尚書》有命十八篇)。二曰“誓”，謹而嚴(《尚書》有誓八篇)。三曰“盟”，約而信。四曰“禱”，切而慤(《尚書·武成》有武王伐紂禱辭，自“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是其文也)。五曰諫，和而直。六曰“讓”，辯而正。七曰“書”，達而法。八曰“對”，美而敏。

下面又一一舉出見于《左氏春秋》的例子。實際上還可以補出一些，詩，歌，謠，誦，這些文學體裁不算。任昉(460-508年)《文章緣起序》中指出的魯哀公《孔子誄》(哀公十六年)，屬於前人常常說到，《文心雕龍》中專篇論述的誄體；《虞人箴》(襄公四年)和見于昭公七年的正考父《鼎銘》屬於“箴銘體”；《文心雕龍·檄移》指出，管仲之對楚人(僖公四年)，呂相的絕秦書(成公十三年)屬檄移體。再如子魚論戰(僖公

1) 按唐代孔穎達之說，《尚書》中的文體有10種。《尚書正義》云：“致言有本，名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什：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誓，四曰誥，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誓，十曰範。”孔穎達并對一些以人之名號為篇名者一一加以說明，亦分別歸于以上十類之中。

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少，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法而懲無禮也。

這里對銘的內容，功用作了闡述。認爲銘在天子只能是“令德”(令“爲動詞，意即表彰)，在諸侯只能是“言時計功”，不能將不義的行爲，事件也作爲銘的內容。自然，臧武仲這段論述中體現了一定的階級立場，但也提出來文章內容的真實性和社會教育作用的問題。

如果宋說臧武仲這段文字尚嫌簡略，那麼，《禮記·祭統》中有一段論銘的文字，則不僅論及內容的問題，也還論及形式方面的問題：

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以昭著于后世者也。……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助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身比焉，順也。昭示后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觀于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下面錄了春秋時衛國孔悝的《鼎銘》全文，又加以評論。文中所說“銘者，自名也”幾句，即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所提出論述文體的四原則中的“釋名以章義”；舉出孔悝的《鼎銘》則劉勰提出的四原則中的“選文以定篇”；範文之前，之后的議論，即“敷理以舉統”。劉勰還提出一個“原始以表時”，這里沒有體現，因爲這段文字本來就已是論銘這種文體內容，體例的早期文獻；后人論銘，則當溯于此，溯于孔悝《鼎銘》等早期作品，以體現“原始以表時”的原則。文中所說的“身比焉”，謂“自著名于下”(鄭玄注)，即屬於格式方面的內容。

以上所引述還不是完全從文體的角度來看問題的。它們只能說是文體學的濫觴。涓涓之流，千折百合，至東漢蔡邕《獨斷》將天子下于群臣之文分爲四類：策書，制書，詔書，戒書。將群臣上于天子者也分爲四類：章，奏，表，駁議。共八種朝廷應用文體(另有“宗廟樂歌”一類，此處未計在內)。還有他的《銘論》，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文體論。曹丕《典論·論文》，範曄《世要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又各有所發展。至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則對以前文體學研究進行了全面的總結與新的推進³⁾。蕭統的《文選》則是當時文體分類理論的

3) 任昉之作，本名《文章始》，《隨書·經籍志》稱有錄無書，則唐代已佚。唯《唐書·藝文

一種實踐。

上面主要是說，在我國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些文體，古人對文體特征的認識與概括也比較早，而且在魏晉時代已形成文體學專著，到南北朝時代已產生在文體研究方面很有理論水平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論述文體劃分的規範。

但是，一個時代的文體，同該時代的政治，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不僅同一文體在不同時代形式，語言風格上會有所不同，而且各種文體所占的主次地位也有變化，甚至有的文體慢慢會沒有人使用，而又產生出新的文體。但消失了的文體，也不是完全消失了，它的某些特征也可能體現在新文體之中；新生的文體，也非完全是新的，大多是吸收了舊有文體的部分特征。其因革流變的關係十分複雜。由于一些作者寫作中的創造性，也有用此法寫彼，以彼法寫此；以彼爲此，以此爲彼的情況。可以說，文體時時處於變化之中，各種文體間的關係也是時時處於變化之中。

由于這些原因，文章的分類總是見仁見智，看法不一。文章學的發展也十分緩慢，而且劃分一直繁雜瑣細，缺乏比較科學的歸納。如蕭統《文選》分文體爲39種，而宋元之際陳仁子編《文選補遺》則爲37種。南宋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分爲二十種（此將河圖洛書，八卦，圖爲一類計），但顯然有遺漏，比如其中下對上之文體有書，表，劄，封事，疏，狀，議等，上對下的策詔之類却一種也未列。明初慶王朱梅編集的《文章類選》四十卷，按文體分爲58類（不收詩而收賦，騷，辭，曲操，樂章，并各爲一類）。到明中葉的吳訥撰《文章辨體》，雖仍分爲58種，但包括各體詩，其他也稍有歸并，增損。稍后徐師曾的《文體明辯》則增爲120種，賀復徵《文章辨體匯選》七百八十卷，更分文體爲132種。明人對文體之條分縷析，此其極矣。

我國古代很長時間中在文體劃分上對文章的用途，使用場合，使用對象考慮較多，即孔穎達所謂“政言有本，名隨其事”。而對文體本身的特征考慮較少，缺乏對文體特征的概括性認識。

將古今所有的文體一一列出，是不可能的。文體具有時代性，已死的和現存的并列一起，也不利于對文體發展認識；而且古今文體之間還有同體异名，同名异體等等複雜的情況。

那麼，有沒有一個辦法將古今文體一并加以劃分，以顯示其類別的特征，而又可以避免

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注曰“張績補”。則北宋以後所傳，乃是張績“補亡”之作。唯今存《文章緣起序》，嚴可均《全唐文》、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俱以爲任昉所作，是也。今看《序》所言與今存之正文多有不合，可知《序》非張績補作。

繁瑣與混亂的情況？

這裡自然就提出一個問題：把文體類別劃分得大一些成不成？但另一方面又得考慮：如將古今的文體歸為幾個人類，這人類是不是還可以看作是文體分類？它能不能說明一種文體的特征及其流變？

從上面兩個方面考慮，對文體作分級劃分，似乎是一種可取的辦法。

事實上，古代一些學者的論著中，已經無意識地表現出這樣的一種認識。如曹丕《典論·論文》中說：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舉出八種文體，而每兩體聯稱，歸為四科，各用一個字來概括其文體方面的特征。此似可以看作是二分法的濫觴（前兩科四體為無韻之文，後兩科四體為有韻之文，似其中也隱含有文筆之辨）。如果將它同稍後的陸機的《文賦》結合起來看，就更清楚了。《文賦》中說：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淒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狂。

分別論述了十種文體的特征，也是兩句為一組，成“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與曹丕所說有所異同，但同樣朦朧地體現出對文體相近者加以歸類的思想。

在作品編集中採用二分法的，如果追本溯源，最早應是《詩經》一書。《詩經》中將所有作品按“風”（民歌，也包括一些上層人事的歌詞），“雅”（用雅言所寫，基本上為嚴整的四言詩，極小有重疊章句的情況），“頌”（宗廟樂歌，因其配合歌舞，因此一般比較短，有一些不太講究句式的整飭），但“風”之中又按地域不同（唱的聲調自然也不同）分為十五國風；“雅”又分為“小雅”，“大雅”；“頌”又分為“周頌”“魯頌”，“商頌”。其較細的一級劃分不完全是從形式上來考慮，而主要是以作品產生的地域，或朝代，或收集的先後為原則劃分的⁴⁾。所以，這還不能說是文體上的二分法。不過，如果我們將“詩”同“賦”，“誄”等文體并列起來看，“詩”已經是一種獨立的文體，也就是說，它已經經過分類。那麼，它下面的“風”，“雅”，“頌”則應看作是二級分類。樂府（民歌），四言詩，頌，這在南北朝以後也一直被作為文體看待，而這裡都歸入“詩”一類，反映了編《詩》者在這一點上比後來很多文體專家還高明一些。只

4) 參拙文《論〈詩經〉的編集與〈雅〉詩的分為“小”，“大”兩部分》，《河北師院學報》1996年1期；《第二次詩經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是由于《詩經》是獨立的一部書，人們忽略了它在文體分類上的啓示意義。

蕭統《文選》在編排上採用了二級分類的辦法，但它在各文體之下是按內容，題材來劃分的。北宋姚鉉(968-1020)編的《唐文粹》也採取這種辦法，但其中“表奏書疏類”分表、書奏、疏、狀四目，則是文體二分法。該書分文體為二十三類，其中二十二類是《文選》的老辦法，唯“表奏書疏”類大概因為按內容題材不好再細分，故如此處理，沒想到歪打正着，倒顯示了文體分類上的一種新的方向。

真正在文體分類上採取了二分法，而且作得比較好的是南宋時代的眞德秀(1178-1235年)。他的《文章正宗》將文體分為“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目，每一目下再分體。其自序云：

正宗雲者，以后世文詞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湮沒弗傳。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由今視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

這詩我國文體分類上的一個很大的進步，具有開創的意義。他立為四目，也可能受到曹丕《典論·論文》的啓發，但主要應是他個人創造性思維的結果，因為象“議論”，“敘事”這樣的完全從形式和反映生活的方式上高度概括的劃分，此前確實還沒有過。當然，眞德秀的道學思想太重，他認為后世文章有脫離正統的情況，才要標舉“正宗”。但我們不論其選們文標準，只從文體學方面說，確是一個貢獻。與眞德秀人體同時而稍遲的嚴羽在其《滄浪詩話·詩體》中對詩歌各體按不同標準，從各個方面進行分類，詩歌分類，從理論上說對散文的分類也有借鑒作用，但該書有的地方在同一類中的劃分不够嚴密，有任意羅列的毛病。明代馮班《嚴氏料謬》中說：“滄浪一生學問最得意處，是分諸體制，觀其《詩體》一篇，于諸家體制渾然不知。”批評是很厲害的。由這也可以看出，古人對文章體制問題很重視。比較而言，眞德秀在文體分類學上的貢獻是突出的。

由于文體的劃分標準不是單一的，所以，在眞德秀之后，又有人從另外的角度上進行分類的嘗試。

清代儲欣《唐宋十大家類選》分文章為六人類：奏疏類，論著類，書狀類，序記類，傳志類，詞章類。每類又分為若干目。比較起來，這種分類法對以前的文體分類考慮較多，是傳統文體分類基礎上的進一步概括。

此后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分文章為十三類：論辯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

韶令類,傳狀類一,碑志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比儲欣分得稍細一點,但比起明代《文章類選》,《文章辨體》,《文體明辨》,《文章辨體匯選》等的分類要概括得多。雖然仍是在傳統分類基礎上的歸并,但却反映出了一級分類在一些學者的二級分類的影響下向二級分類類別靠攏的情況;清末吳曾祺編《涵芬樓古今文鈔》,便採取了姚鼐的十三類分法,却在每一類下面又分為若干體。

從二級分類的方面探索走出了新路的,是作為桐城派支脉與后翼的李兆洛,曾國藩。陽湖派作家李兆洛的《駢體文鈔》只就駢文而言分為三大類,32種:

一,廟堂之制,進奏之篇(包括銘刻,頌等 19類);

二,指示述意之作(包括書,論,序等 8類)

三,緣情托興之作(包括設辭,七,連珠等 5類)

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也分為三大類,稱作“門”,每一門中再分類:

一. 著述門,包括三類:

1. 論著類(論著之無韻者);

2. 詞賦類(著作之有韻者);

3. 序跋類(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

二. 告語門,包括三類:

1. 韶令類(上告下者);

2. 奏議類(下告上者);

3. 書牘類(同輩相告者);

4. 哀祭類(人告于鬼神者)。

三, 記載門,包括4類:

1. 傳志(所以記人者);

2. 敍記(所以記事者);

3. 典志(所以記政典者);

4. 雜記(所以記雜事者);

這個劃分比以前各種分類方法都清楚,邏輯上也比較嚴密。不僅所劃分三大門十一類自成體系,而且如果按他以前,以後有關著作分體的情況,他所標的類之下,還可以注出一些“體”來。因而,他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三級分類”的方案。曾國藩這種劃分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注重文章使用傳播中的人我關係,體現出很強的倫理性。可以說,它最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體分類的特征。

清代的文體分類比起明代來,有很大的進步,但同真德秀的“四目”比起來,大都仍然注重于文章的功用和使用者,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格式,語氣,而考慮表現方式,寫作手法,結構特征方面的因素較少,也就是說,仍然缺乏從文章內在因素,本質特征上的分析概括。

曹丕《典論·論文》在談四類文體的特征時說:“文本同而末異。”所謂“本”,指文章的共同規律;所謂“末”,指各體文章的特征。以此思想而用于文章的類,體特征的認識,便是:每一類中都有其共同的特征,同一類中不同的文體之間又有其差異。但是以什麼為標準來劃分,這可以有很多答案。另外,《文心雕龍·通變》中說:“夫說文之體有常,變化之數無方。”不但文體間的關係是相對的,任何一種文體的特征也只是相對穩定。這就給文體的劃分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在西方一些學者文章分類理論的影響下,我國有不少學者致力于文章分類的新的探索與研究,提出一些很有價值的見解,如陳望道,葉聖陶,夏丏尊,蔣伯潛,張壽康等。他們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繼承我國文體分類的傳統,另一方面吸收西方理論,在我國文體分類理論的建設上作出了貢獻。他們也對自己的分類不斷修改,使之越來越完善。這些理論不僅對現代文章的分類有意義,對我國古代文章分類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意義。

雖然我國的文體分類問題比較複雜,但經過了多年的探索,學術界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慢慢趨于一致。我覺得除了分類學的一般原則之外,應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應將功用與表現方式結合起來考慮。用單一的標準來劃分,總會遇到一些不好解決的問題。

第二,應採用多給分類的辦法。

第三,要考慮到我國的文化傳統,同時也必須要有現代性,為建立現代中國文章學體系和幫助人們認識各體文章的特點和規律服務。

第四,不能層次太多,分類太繁,不易掌握。

以上由先秦時代的文體分類談到中國古代的文章分類學。我覺得,只有對我國古代文章分類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思想,有一套可行的辦法,再用以討論先秦散文的文體學分類,才有意義。先秦散文自然有許多與后代不同的特征,但如完全按先秦散文的情況劃分文體,採取就事論事的辦法,也沒有多大意義。《尚書》,《逸周書》,《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和諸子書當中,都有一些本為單篇的文章,《文章正宗》,《文章類選》,《文章辨體》,劉祐《文章正論》,唐順之的《文編》,鐘惺的《周文歸》,賀復徵的《文章辨體匯選》,清人的《古文淵鑒》,《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等都選過不

少。我們如果能對先秦散文進行文體學研究，不僅對先秦文學的研究，對古代文學思想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意義。

先秦 文體 分類와 古代 文章 分類學

翻譯：金 元 俊

先秦 散文은 지금까지 학자들에게 중시되었고 후대 문장에 심대한 영향을 미쳤다. 종래 연구 방면을 보면 한결같이 철학·정치·역사 등 사회과학 방면 연구의 논저들은 던져두고 언급하지 않고, 단지 解讀·評析 방면의 논저만이 아주 많다. 지금까지 先秦 諸子와 先秦 史傳 방면의 논저와 관련해서 모두 선진 산문과 유관한 것이라 말한다. 그러나 선진 산문 연구는 영역을 확장, 한층 더 심화된 연구를 기대할 수 있다. 나는 5개 방면으로 나누어 연구를 할 수 있다고 본다. (1) 문헌학 방면의 연구(선진 문헌을 발굴하여 선진 산문 저작의 진위, 창작 시대의 자세한 심사, 篇·章의 分合, 작자 확인, 문헌의 처리 등), (2) 시대구분의 연구(하·상·동·서주·춘추·전국시대 산문의 시대적 상황을 나누어 연구), (3) 문체학 연구, (4) 지역 특징에 따른 연구(충원, 제로, 남초, 진 등지의 문풍적 특징), (5) 유파 연구(선진 제자들의 문풍 표현은 각자 독특한 풍격을 드러내나. 그런 까닭에 유·도·묵·법가 등 적잖은 사상적 유파가 있으며 이것이 산문적 유파로 나타난다.), 기타 문체는 잠시 논외로 하고 앞서의 논의들을 선진 시대의 문체 분류와 당시 사람들의 문체 인식을 순서대로 논의하여 우리의 고대 문장 분류학을 말하고자 한다.

각개 민족의 각종 문장은(실용문과 문학작품 포함) 그 민족의 역사·문화가 내용에 적잖게 반영되었으며, 그 형식도 민족적 특징을 가지고 있다. 문체는 사회적 발전을 수반하며 발전하고 한 사회의 문화 상황이 반영된다. 그러나 한 시대의 문체는 본시 과거의 문체 발전 변화가 있는 이래로 변혁하고 계승한다. 물론 그렇다. 과학적 문체학이 세워지고 우리 나라 문체의 실체가 반영되어 제출되고, 또 현대 과학성의 문체 분류법이 갖추어졌으니, 마땅히 이전의 문체 발전 정황의 통시적 이해와 심도 있는 이해가 요구되며 또 국의 문장 분류방법 연구에 대한 전면적 비교와 이해가 요구되며, 동시에 우리의 고대 문장 분류 발전

과정과 문장 분류 이론들도 다루어져야 한다. 이런 작업은 이전에 이루어지지 않았다. 이 작업은 실질적 수행과 수립이 매우 어렵다.

고대 문체 분류와 관련하여 최근 십수년 전에 이미 연구 논저가 발표되었는데 諸斌杰 선생의 《中國古代文體概論》 같은 것이다.

문장은 형식이 같지 않으며 체제의 형성도 같지 않았으니 이는 매우 일찍부터였다. 문자가 만들어지기 전에 이미 제사가 있었으며, 씨족이 있으므로 부락회의가 있었으며, 씨족에는 부락의 수장이 있어 항상 포고령을 발표하였으며, 혹 조금의 사정을 도모하고자 訓告하였다. 이에 禱辭(기도말), 훈고, 명령 등의 언어 형식이 곧 만들어졌다. 이와 동시에 신화고사, 전설, 가요와 초기 자연과학 지식의 결정체와 사회 예측 규범의 언어들이 모두 만들어졌다. 이 얼마간의 말들은 사용 장소와 사용 대상이 같은 까닭에 형식에서 언어 품격까지 모두 같지 않아 이는 곧 다른 “문체”를 형성하게 되었다. 그러나 이것은 그들이 문자가 고정된 이래 사용된 것이 아니기 때문에 능히 문장을 찌할 수 있는 것은 아니다; 그 형식이란 것은 단지 세상에 이루어진 약정에 따른 표술 방식만을 말할 뿐 “문체”라고 말할 수는 없다. 그들에게서 歌·謠·諺을 제거하고도 운문 형식의 제사·기도의 말(伊耆氏의 《蠓辭》) 전해지는 것은 오랜 口耳의 전승 때문이며, 문자가 만들어진 후 대나무와 비단에 써여짐에 이르러서는 기타의 것들은 곧 없어지거나 혹은 서서히 변형되었으니 심지어 후대 東西시대에(후에 일종의 정황에 속하는 《尙書·堯典》)까지 이른다. 그러나 口頭(말)에서 최초의 書面語에 이르기까지 빠지고 없어진 것들이 필연적으로 아주 많았으나 후대의 이른바 “문장”이란 것은 곧 여기에서부터 생산되었다. 사람들이 만든 문자 수의 증가에 따라 언어에 대한 문자의 기록 효용이 증강되어 각종 문장이 생산되었으며, 각종 문체가 따라서 생산되었다.

우리 나라는 고대부터 문체의 인식이 빨랐다. 《尙書》 가운데 문장의 편명이 적지 않았으며, 실재상 문체명이 작가의 이름 앞에 있다.(작가의 이름이 제목이 되기도 하고 어떤 것은 편중의 몇 자를 제목으로 하였다.) 《상서》와 같이 이 책의 전권이 名을 취한 정황이 일치한다. 《상서》 중에는 “典”, “謨”, “誓”, “誥”, “訓”, “命”과 같은 문체 명칭이 있다. 또 《國語·魯語》에 이르길 “옛날 정고부가 주태사 때 尙의 頌 12편을 교정하여, 《那》로써 첫머리를 삼았다. “頌”은 민가(風)와 귀족, 문인의 일반 서정, 풍자의 작(“雅”)에 상대되는 말로

내용상·형식상 그 특징이 적지 않다. 《국어》 중 이 일단의 말이 보이며, 商代에 이미 이것들을 체제로 서로 같은 작품이 모여 발생하니 “송”이라 이름 붙여준다. 《逸周書》, 《左氏春秋》, 《國語》, 《戰國策》 등의 책에서도 선진 시대의 서로 다른 체제의 문장들이 적지 않으며, 송대 陳揆의 《文則》은 《좌씨춘추》 중에 있는 문체를 8종으로 총괄했다.

《좌씨》를 살펴 雅趣한 문장을 적출하고 팔체로 구분하여 각 본문을 갈래지었다. (1) “命”으로 완곡하면서도 타당해야 한다. (《상서》 命 18편이 있다.), (2) “誓”으로 삼가면서도 근엄해야 한다. (《상서》에 8편이 있다.), (3) “誥”으로 간략하면서도 신의가 있다, (4) “禱”로 간절하면서도 삼가해야 한다. (《상서·무성》 무왕이 주를 정벌할 때 기도말이 있다. “오직 도 있는 증손 주왕이 말합니다”에서부터 “신에게 부끄럼이 없다”에 이르기까지 이것이 그 문장이다.), (5) “諫”으로 온화하면서도 강직해야 한다, (6) “讓”으로 구분하여 바르게 하는 것, (7) “書”로 통달하여 법칙에 맞는 것, (8) “對”로 미려하고 민첩함이다.

아래에 또 일일이 《좌씨춘추》의 예를 들어 보았다. 실제상 어느 정도 보태었으나 시·가·요·송 같은 문학은 계산하지 않았으며, 任昉(460-508)은 《文章緣起序》 중에 魯哀公의 《孔子誄》(애공16년)를 지적하여 전인들이 늘 말해왔던 《文心雕龍》 중 전문적으로 편한 논술인 碑體에 귀속시켰다; 《虞人箴》(애공4년)과 소공 7년의 正考父의 《鼎銘》에 보이는 것은 “箴銘體”에 속한다.

《문심조룡·檄移》에 나오는 관중의 楚人에 대한 격문과 여상의 절주서는 격이 체에 속한다. 자어의 전쟁을 논한 것(희공 22년), 안자의 ‘和同’을 논한 것 (소공 20년), 자산의 ‘尹何爲邑’(양공 13년)을 논한 것은 논변체에 속하고; 왕자가 조정에서 제후에게 고하는(소공 26년) 것은 조령체에 속한다. 《좌씨춘추》에서도 최소한 십수종의 문체가 보인다. 명나라 吳訥의 《문장변체》에 각 문체에 따라 諭告·論諫·書·序·銘·誥를 논급했고, 서사증의 《문체명변》에는 ‘命’, ‘盟’, ‘書記’, ‘論’, ‘序’, ‘文’, ‘雜著’, ‘箴’, ‘銘’, ‘祝文’을 논술하였는데 또한 선진 문장의 예를 많이 수록해 놓았다. 청의 요내가 편한 《고문사료찬》에서는 다른 사람의 작문을 반조하여 자기 작문의 “의법”을 살폈는데, 선진 산문 가운데에 “奏議類”는 《전국책》에서 6편, 이사의 문에서 2편을 가렸고, “書說類”는 《전국책》에서 38편을 뽑았고, “詔令類”는 진시황에서 1편 뽑았고, “碑傳類”는 이사의 刻石

文中에서 6편을 뽑았으며, “辭賦類”는 굴원과 송옥의 작품 외에 《전국책》의 <초인이익설경양왕><장신설양왕>이 아울러 수록되었는데, 다만 이는 《상서》《좌씨춘추》《국어》와 제자백가서에는 미치지 못한다. 이상에서 언급한 여러 책들을 모두 살펴 봄으로써 대략적이거나 선진시대 문체 발전의 상황을 알 수 있다.

우리나라 고대는 문체의 인식과 개괄적 귀납에 대한 관심이 비교적 이른 편이다. 《주례·춘관·대축》 가운데 언급을 보면:

六辭를 지어 상하, 친속, 원근을 통한다. (1) 祠, (2) 命, (3) 誥, (4) 會, (5) 禱, (6) 誄

이 “육사”의 작용은 이미 “상하, 친속, 원근을 통한다”하였으니 드러남이 응용문을 포괄하고 기타 문체인 시가·춘추(사서)·복사 등에만 내재된 것이 아니다. 東漢 鄭玄의 해석을 살펴보면 “육사는 모두 生人이 지은 말로써 死者의 일이 될 수 없다.” 이 말에 따르면, 大祝(大神官)이 이 “六辭”를 맡아 본시 현실 정치 생활 중 상하, 원근의 많은 관계 사이에 쓰이며, 귀신·人祗(땅귀신) 제사의 문자에 이르기까지 ‘六祈’의 범위에 들어간다. 《대축》 편은 위에서 인용한 이 단락의 글자 앞에 이르길; “六祝의 축사를 맡아서 귀신의 계시를 섬긴다”, “육기를 맡아서 귀신의 계시에 동참한다.” 《주례》 원문에 “육축” “육기”의 구체적 이름이 또한 설명되어 있다. 《문심조룡·축맹》에 이르길:

주의 대축은 육축의 축사를 담당하여, “만물이 함께 소생하라”라는 말로써 천지의 제사 때 진언하고, “넉리 위광에 싸여지라”는 해를 맞이하는 예배에서 읊어졌고, “새벽에 일찍 일어나고 밤늦게 자리에 든다”는 祖廟에 쓰는 축문의 말이며, “다복하고 무강하라”는 향연 때 펼쳐지는 것이다. 원정이나 출정 때 제사에도 축문이 없을 수 없다.

유협의 “육축”이 6종의 문체가 되었다. 三代 이전에 귀신을 섬기고 제사를 중히 여긴 까닭으로 제사와 관련한 의식·문체가 나누어져 아주 세분화되었다. 우리들은 장차 이 ‘육축·육기’를 분별하여 하나로 병합 모두 한 종의 문체로 보려 하니 곧 《주례·대축》 또한 8종의 문체로 귀납되어 나타난다. 이 8종 문체는 태축이 많으니 이는 단지 주대 조정의 응용문의 일부분이 되었다. 그 설에 따라, 이 종의 개괄로 전체를 비교할 수 있다.

《좌씨춘추·양공십구년》에 실려 있는, 노국이 장차 제국과 함께 전투하여 획득한 병기를 주물하여 無射之鍾을 만들어, 위쪽에 글을 새겼으니, 장무중(장

홀)이 이로 인해 “명”의 문자를 처음으로 논하고, 이 “명”을 말하므로써 “명”이란 문체를 가장 빨리 전문 논의했다:

무릇 銘에 천자가 德을 내리고 제후가 때를 말하고 공과를 계획하며 대부가 공을 세우기에 적합하다. 지금 공을 세움은 하등이며, 공을 계획함에 남을 빌리며, 시기를 말함에 백성들에 거리낌이 많으니 어찌 銘이라 하겠는가. 또 무릇 큰 것이 작은 것을 정벌하여 그 소득으로 이기(祭器)를 만들어 그 공열을 새겨서 자손에게 보여주어 明法을 밝히고 無禮를 징계코자 한다.

銘의 내용은 공적을 지어 천명한다. 銘에는 천자는 단지 능히 “수德”이 있으며, 제후는 “言時計功” 만이 있다고 생각하여, 장차 不義의 행동을 할 수 없게 사건들을 銘의 내용으로 짓는다. 자연히 장무중의 이즈음 단계의 논술 중에서 일정 계급적 입장을 구체적으로 드러내고 있으나, 제출된 문장 내용은 진실성과 사회 교육 작용의 문제이다.

만약 宋說에 장무중은 이 단계 문자는 오히려 간략한 것을 혐기한 것이 된다면, 《예기·제통》중에 크게 銘의 문자에 논의한 것이 있으니, 다만 내용의 문제에 대한 논급뿐만 아니라 형식 방면적 문제에 대해서도 논의한 것이 적지 않다:

銘은 自名이다. 스스로 이름하여 선조의 아름다움을 칭송 선양하여 후세 사람들에게 밝혀 드러내는 것이다.…… 명은 그 선조의 善德·공열·훈로·경상과 천하에 드날린 이름을 가려 논하고 제기에 술을 따라 스스로 그 이름을 이루게 하여 그 선조께 제사하는 것이다: 신분을 비교하여 순서대로 한다. 후세에 밝혀 가르친다. 무릇 명은 한마디로 말해 상하가 모두 얻는 것이다. 이런 까닭에 군자는 銘을 살펴야 한다. 이미 그 칭찬 바를 찬미했으면 또 그 할 바를 찬미하라. 행하는 자는 명철함을 족히 드러내고 仁함을 족히 더붙어 하면 어질다 할 만하다. 어질고 伐하지 않으면 가이 공손하다 할 만하다.

아래 쪽에는 춘추시대 위나라 공희의 《정명》 전문을 수록하고 평론하였다. 글 가운데 언급한 “銘者, 自名也”라 한 몇 구는 유협의 《문심조룡·序志》에서 제출한 문장의 4원칙 가운데 “釋名以章義(명칭을 해석하여 뜻을 드러낸다)”를 논술한 것이다.; 공희의 《정명》을 들어, 유협은 4원칙 중의 “문장을 가려 篇을

정하였다”를 제출했다; 모범 문장의 전·후의 논의는 즉 “이론을 펼쳐서 계통을 세웠다”이다. 유협이 “原始以表時(기원을 이끌어 내어 연혁을 표시하고)” 이 하나를 꺼집어내니, 이는 문체의 현현을 다 빼앗아버렸다. 왜냐하면 이 단락 문자는 본래 銘이 이 류의 문체 내용·체례의 초기 문헌을 이미 논했기 때문이다. 후인의 銘에 대한 논의는 마땅히 여기에서부터 거슬러 올라가야 하며, 공희의 《정명》 등 초기 작품에서 거슬러 올라가서 “原始以表時”의 원칙을 구체적으로 드러냈다. 글 가운데서 말한 “身比焉”, “自著名于下”(鄭玄의 注)는 격식 방법의 내용에 속한다.

이상에서 서술한 것은 완전히 문체의 각도에서 바라본 문체는 아니다. 그것들은 단지 문체학적 남상이라 말할 수 있다. 면면히 흘러 천 번이나 꺾이고 백 번이나 함쳐서 東漢 채옹의 《獨斷》에 이르러서는 天子가 못신하들에게 내리는 문체가 4가지로 분류되었으니: 策書, 制書, 詔書, 戒書가 그것이다. 못신하가 위로 천자에게 올리는 문체도 나누어져 4가지로 분류되는데: 章, 奏, 表, 駁議가 그것이다. 모두 8종으로 조정의 응용문체이다. (따로 “중요가약” 한 부류가 있으나 여기에서는 포함시키지 않았다.) 또한 그것의 《명론》이 있으니 이는 우리나라 최초의 문체론이라 할 수 있다. 조비 《전론·논문》, 범환 《세요론》, 육기 《문부》, 지우 《문장류별론》, 이충 《한림론》 등이 각기 발전하였다. 임방 《문장연기》, 유협 《문심조류》에 이르러서는 이전에 비해 문체학 연구 진행이 전면적 총괄과 새로운 추진이 있었다. 소통의 《문선》은 당시 문체 분류 이론의 일종 실천인 것이다.

위의 말은 중요한 언급으로 고대 우리 나라는 아주 이른 시기부터 적지 않은 문체가 있어서, 고인들의 문체 특징에 대한 인식 및 개괄 그리고 비교가 빨랐으며 또 위진시대에 이미 문체학 전문 저서가 이루어졌으며, 남북조 시대에 이르러서는 이미 문체 연구가 이루어져 이론을 동반한 저작들이 매우 많았으며 또한 문체 분획 규범의 저술들도 나왔다.

그러나 한 시대의 문체는 동시에 그 시대의 정치·사회생활과 밀접한 관계를 가지고 있다. 동일한 문체라도 시대 형식과 언어 풍격상 모이는 바가 같지 않아 다른 것이 적지 않으며, 또 각종 문체가 점유하는 主·次的 지위에 따라 변화가 있으며, 심지어 더디게 민멸하는 문체를 사용하는 사람들이 있으며, 또 새롭게 나온 문체도 있다. 그러나 소실된 문체라도 완전히 없어지지는 않았으니 그것의

조금한 특징을 매개로 새로운 문체 중에 구체적으로 나타날 수 있으니; 새로 생산된 문체라도 완전히 새로운 것이 아니어서 옛 문체의 부분적 특징을 받아들인 것도 많다. 그 원인과 연혁 그 변화의 관계는 아주 복잡하다. 몇몇 작가가 작품의 창조성을 베풀어 이 방법으로 저것을 베끼고, 저 방법으로 이것을 베껴 쓰는 것이 있으니; 저것으로 이것을 삼고 이것으로 저것을 삼는 상황이다. 가이 말하겠는데 문체는 때때로 변화의 가운데 처하며, 각종 문체 사이의 관계 또한 이처럼 때때로 변화의 가운데 처한다.

이 사소한 원인으로 인하여 문장의 분류는 모두 寬仁하게, 明智하게 보아야지 하나의 법칙으로 보아서는 안된다. 문장학의 발전은 아주 완만하고 또한 분획이 한결같이 번잡하고 잘고 가늘어 비교 과학적 귀납법이 결핍되어 있다. 소통의 《문선》 같은 것은 39종으로 문체를 나누었으며, 宋·元 사이에 陳仁子가 편한 《문선보유》는 37종으로 문체를 분류했다. 남송의 왕정진 《고문집성전집》에서도 20종(이는 하도낙서, 팔괘, 도를 한 류로 계산했다)으로 나누었으나 지금 보이는 것에는 유실된 것이 있으니, 예컨대 그 가운데 아랫사람이 윗사람에게 올리는 문체로는 書, 表, 劄, 封事, 疏, 狀, 議 등이 있으며, 윗사람이 아랫사람에 대한 문체로는 策詔의 類로 일종만 있어 나열이 미흡하다. 명초 경왕 주매가 편집한 《문장유선》 40권을 살펴보면 문체가 58류로 분류되었다. 명 중엽에 이르러 오늘이 찬한 《문장변제》는 비록 58종(시는 따로 하고 부, 소, 사, 곡조로 약장은 아울러 한 류로 보았다.)으로 분류했으나 각체의 詩를 포괄하고 기타 사소한 것은 병합 가감하였다. 조금 뒤 서사증의 《문체명변》은 덧붙태져 120종이 되었으며, 하북징의 《문장변체회선》 780권에는 다시 문체를 132종으로 나누었다. 명인들의 문체에 대한 瑣微한 분석이 이와같이 심했다.

우리 나라 고대의 아주 긴 시간 중 문체를 분획하는데 있어 문장의 용도·사용장소·사용대상을 비교적 많이 고려하였으니 공영달이 소위 “말이 되기 위해서는 근본이 있고, 이름에는 일이 따르게 된다.”라고 하였으니, 문체 자체의 특징에 대한 고려가 비교적 적으며, 문체 특징의 개괄성 인식에 대해서도 결핍되어 있다.

고금의 문체를 일일이 열거하는 것은 불가능하다. 문체는 시대성을 띠고 있으며 이미 사멸된 것과 현존하는 것이 함께 일어날 수 있어 문체 발전을 인식하는데 있어 순조롭지 않다. 또한 고금의 문체에는 같은 문체에 다른 이름이 있으며

같은 이름에 다른 문체가 있을 수 있어 복잡한 상황이다.

그러면 하나의 방법이 고급 문체를 아울러서 분획하고 분류별 특징을 드러낼 수는 없을까? 또 번잡·세밀함과 혼란한 정황을 피해 낼 수는 없을까? 이는 자연 하나의 문체를 제기하는데: 문체를 유별로 파악하여 분획하는 것이 다소간 이라도 이루어 질 수 있을까? 단 별도의 한 방향을 고려한다면; 만약 고급의 문체를 몇 개의 큰 부류로 귀납한다면, 이 큰 부류가 문체 분류로 만들어 질 수 있는냐는 것이며, 그것이 문체의 특징과 변화과정을 설명할 수 있는냐는 것이다.

위의 양방면을 고려해서 따른다면 문체를 級으로 나누고 분획을 매겨 일종의 판별법을 취할 수도 있다. 사실상 고대 몇몇 학자의 논저 중에 이미 저와 같은 일종의 인식이 무의식 중에 표현되었다. 조비 《전론·논문》의 언급을 보면:

무릇 문은 근본은 같고 末은 다르다, 대개 奏議는 마땅히 雅하고 書論은 理하며 銘誄는 實을 숭상하고 詩賦는 麗하고자 한다. 이 4과는 같지 않다.

그런 까닭에 능한 자는 편벽된다. 오직 재능이 달통해야 그 체를 갖출 수 있다

8종의 문체를 들어 每 兩體를 연하여 칭해 4과로 돌렸다. 각 한 개의 글자를 사용하여 그 문체 방면의 특징을 개괄했다. 이는 흡사 이분법적 낭상임을 볼 수 있다.(앞의 兩科四體는 운이 없는 문이 되고, 뒤의 兩科四體는 운이 있는 문이 되어 흡사 그 가운데 문필의 구분이 은연히 함축되어 있는 듯하다.) 만약 그 동일함이 조금 뒤인 육기 《문부》와 결합되어 있다고 본다면, 다시 분명하게 될 것이다. 《文賦》가운데의 말을 보면:

시는 정과 인연하여 아름답고, 부는 사물을 體로 하여 청명하다.; 비는 글로써 서로의 질정을 나누고, 외는 마음에 감기어 서글프고; 명은 박약하여 온화유태하고, 잠은 저으기 생각하고 말고 장대하다; 송은 한가함으로써 문체가 성하고, 론은 정미하고 명랑·화창하다.; 주는 고루 통하여서 한적하고 아취가 있으며, 실은 왕성하고 홀광한 것이다.

10종 문체의 특징을 분별 논술하였으며, 또 兩句가 한 조가 되어 “詩賦”, “碑誄”, “銘箴”, “頌論”, “奏說”로 이루어져 조비가 말한 것과 同異가 있으나 같은 양식이 섞이면 서로 가까운 문체는 類로 돌아가려는 생각이 구체적으로 드러난다.

작품을 편집한 것 중 이분법을 채용한 것이 있어, 근본을 좇고 근원을 거슬러

올라 간 것으로 가장 이른 것은 《시경》이다. 《시경》에 나오는 작품 중 ‘풍’(민가, 몇몇의 상층인사의 노래도 포함), “雅”(雅言을 사용하여 묘사, 기본적으로 엄정한 사언시이며, 아주 작게 重章疊句의 정황이 있다), “頌”(종묘악가, 가무가 배합됨에 따라, 이로 인해 일반 비교가 부족하나 그다지 句式의 정칙에 궁구하지 않았다.). 그러나 “風” 중에는 지역에 따라 달라 15국풍으로 나눌 수 있다.(노래의 성조가 자연 다르기 때문이다.) “雅”는 “小雅” “大雅”로 나눌 수 있다. “頌”은 “周頌” “魯頌” “商頌”으로 나눌 수 있다. 비교적 세밀한 일급 분류이 형식에서 온 것임을 고려한다면 불완전하나, 작품 창작 지역 혹 왕조별 혹 수집의 선후가 분류의 원칙이 되므로 주요한 요인이다. 따라서 이는 문체상 이분법으로 설명할 수 없다. 만약 우리가 “詩”는 “賦와” “話”등과 같이 문체가 병렬하여 발생한 것으로 본다면, “詩”는 이미 一種의 독립 문체이니, 이 말은 시는 이미 통과된 분류이다. 그러면 그 아래 쪽의 “風”, “雅”, “頌”은 응당 2급 분류로 보아야 한다. 악부(민가)·사언시·송, 이것은 남북조 이후 줄곧 문체로 간주되어 지어져 이것들은 모두 “시”의 한 부류에 귀속되어졌으며, 《시》를 엮는 자에게 반영되어 어느 정도 비교된 후에 많은 문체 전문가들에게 고양되었다. 다만 《시경》이 독립적인 한 부류의 책이 된다면 사람들은 그 문체 분류상에서 보여주는 의의를 홀시 생략할 것이다.

소통 《문선》은 편제 배열상 2급 분류 방법을 채용하고 있다. 단 거기에는 각 문체 아래에서 내용·재제가 분류되는 것을 볼 수 있다. 북송의 요현(968-1020)이 평한 《唐文粹》도 이 방법을 채용하고 있으나 그중에 “表奏書疏類”는 表, 書奏, 疏, 狀 四H으로 분류하였으니 이는 문체 2분법이다. 그책은 문체를 23류로 나누었으며, 그중 22류는 《문선》의 옛 방법으로, 오직 “표주서소”류는 대개 내용과 재제를 살피기 때문에 다시 세분하는 것을 좋아하지 않았다. 그런 까닭에 이같은 처리는 뜻밖에도 우연히 맞아, 도리어 문체분류상 일종의 새로운 방향을 보여주었다. 진정 문체 분류상 2분법을 채용하고 또 비교를 잘한 사람으로는 남송시대 진덕수이다.(1178-1235) 그의 《문장정종》에서는 문체를 “辭命”, “議論”, “敘事”, “詩賦” 4H으로 분류하였으며 每 一H 아래 다시 체를 나누었다. 그 자서에 이르길:

정종이라 이르는 것은 후세에 문사가 많이 변하여 배우고자 하는 자가 그 원류의 바를 알게 하고자 함이다. 예로부터 모아지고 수록된 문장이

많으니, 두예, 지우 같은 사람들은 종종 없어서 전하지 않는다. 지금 세상에 전해지는 것은 오직 양의 《소명문선》, 요현의 《문수》 뿐이다. 지금 이것을 보니, 兩書의 기록된 바가 과연 그 원류의 바를 얻은 것인가? 고로 지금 편집하여 의리를 밝히고 세상에 쓰여짐이 긴절하기를 주로 한다. 그 문체는 옛 것에 근본하며 그 가리키는 것이 경서에 근접한 연후에 취했다. 그렇지 않은 즉 말이 비록 공교롭더라도 기록하지 않았다. 그 條는 4 종류로: 사명, 의론, 서사, 시부이다.

이는 우리 나라 문체 분류에 있어 하나의 매우 큰 진보이며 창조적 의의가 있다. 그가 4목을 세운 것은 조바의 《전론·논문》의 계발을 받아들여서 가능하나 그 개인의 창조적 사유의 결과가 주요하다. 왜냐하면 “의론”, “서사”와 같은 양식의 완전함을 형식과 생활 방법상 고도의 개괄적 분획의 반영이 따라야 하므로 이전보다 확실하여 지나침이 없다. 마땅히 진덕수의 도학사상은 아주 중요하다. 그는 후세 문장은 정통적 정황을 벗어나야 한다고 생각하고, 이에 “正宗”을 들어 표방하였다. 다만 우리들은 가려낸 문장을 표준으로 논하지 않고, 단지 문장학 방면의 설을 따르니 확실히 이는 한 공헌이다. 진덕수와 대체로 동시대이나 조금 뒤인 엄우는 《창랑시화·시체》중에 詩歌各體에 대해서 동일한 표준이 아니라고 보고 각개의 방면으로 진행 분류하였다. 시가 분류는 이론상 산문적 분류를 따르고 借鑒作用이 있다. 그러나 그 책에 어떤 지방은 동일하게 한 류로 적중되는 분획이 그다지 엄밀하지 않고 임의로 나열한 부정확한 병폐가 있다. 명대 풍반 《엄씨료류》에서 말하길: “창랑이 일생동안 이론 학문의 최고 득의처는 여러 체제의 구분이다. 《시체》 일편을 보면 제가의 체제를 전혀 알 수 없다.” 비평이 대단히 맹렬하다. 이는 고대에 대한 문장체제 문제를 매우 중시한 것으로 볼 수 있다. 비교하여 말하면 문덕수가 문체 분류학적 공헌이 두드러진 것이다.

문체의 분획 표준에 의하면 단선적이지 않기 때문에 진덕수 이후 사람들은 별도의 각도에서 분류 작업을 일찍이 시도하였다.

청대 저흔 《당송십대가류선》에서 문장을 여섯 개의 큰 류로 나누었는데: 奏疏類, 論著類, 書狀類, 序記類, 傳志類, 詞章類이다. 每類는 약간의 조목으로 나누었다. 비교하여 보면, 이 종류의 분류법은 이전의 문체분류를 비교적 많이 고려하였으니, 이는 전통 문체 분류를 기초로 한 걸음 더 나가 개괄한 것이다. 이후

요내 《고문사류찬》은 문장을 13류로 분류하였는데: 서변류, 서발류, 주의류, 서설류, 증서류, 조령류, 전장류, 비지류, 잡기류, 잡명류, 송찬류, 사부류, 애제류가 있다. 저흔과 비교하면 조금 더 세밀한 분류이나 근래 《문장류선》 《문장변체》 《문체명변》 《문장변체회선》 등의 분류에 비한다면 많은 개괄을 얻기를 요한다. 그러나 여전히 이는 전통분류 기초 위로 돌아가는 것이기는하나 도리어 일급분류는 몇 학자의 이급분류의 영향 하에 있어 2급분류 유별로 접근하는 상황을 반영하는데: 청말 오증기가 편한 《합분루고금문초》는 곧 요내의 13분류법을 채용했으나 도리어 每一類 아래쪽에 또 약간의 체를 분류하고 있다. 2급분류의 방면에 따른 탐색은 새로운 길을 출현시켰는데, 이것이 동성과 지맥과 후에 법 삼은 이조락, 중국번이다. 양호와 작가 이조락의 《駢體文鈔》는 단지 변문을 취하고 큰 3류, 32종으로 나누어 말했다.

- 一. 묘당의 체제, 進奏의 편(銘刻, 頌 등 19류 포함)
- 二. 지시하여 뜻을 서술한 작(書, 論, 序 등 8류 포함)
- 三. 情에 연유하여 興을 기탁한 작(設辭, 七, 連珠 등 5류)

중국번의 《경사백가잡초》는 3가지로 큰 류를 나누어 “門”이라 칭하고 每一門 가운데 거듭 분류하였다.

- 一. 著述門, 3류 포함.
 1. 論著類(韻이 없는 논저)
 2. 詞賦類(韻이 있는 저작)
 3. 序跋類(다른 사람이 지은 것, 그 뜻을 서술한 것)
- 二. 告語門, 3류 포함
 1. 詔令類(윗사람이 아랫사람에게 알리는 것)
 2. 奏議類(아랫사람이 윗사람에게 알리는 것)
 3. 書牘類(같은 무리들이 서로 고하는 것)
 4. 哀祭類(사람이 귀신에게 고하는 것)
- 三. 記載門, 4류 포함
 1. 傳志(사람을 기록하는 것)
 2. 敍記(일을 기록하는 것)
 3. 典志(정전을 기록하는 것)
 4. 雜記(잡사를 기록하는 것)

이러한 분획은 이전의 각종 분류 방법에 비해 모두 분명하고 논리상 비교적 엄밀하다. 3入門 11類로의 분획은 스스로 체계를 이룰 뿐 아니라 그 이전과 그 이후 저작과 관련하여 분체의 정황을 살펴 보면, 그 표지류의 아래에 어느 정도 “체”가 올 수 있도록 기재할 수 있다. 그러므로 그것은 실제상 한 개의 “3급분류” 방식을 제출하는 것이다. 중국번의 이와같은 종류의 분획에 나타난 하나의 두드러진 특징은 문장 사용 전과 중 남과 나의 관계에 중점을 두어 문체에 아주 강한 윤리성을 드러내는 것이다. 가이 말한다면 가장 집중한 것은 중국 전통 문체 분류의 특징을 구체적으로 나타내는 것이다. 청대의 문체 분류를 명대 이래와 비교하면, 아주 큰 진보가 있다. 단, 진덕수의 “사목”과 같은 것에 비한다면, 대체로 여전히 문장의 효용과 사용자·접수자의 신분에 중점을 둠으로써 문장의 격식·어기에 영향을 미치게 하여 표현방식, 寫作手法, 결구특징 방면의 요소를 비교적 적게 고려하였다는 것이다. 이와같은 설에 따르면 여전히 문장 내의 요소와 본질 특징상의 분석 개괄에 결핍을 초래한다.

조비의 《전론·논문》에는 4류 문체의 특징에 따라 말하는데; “문은 근본은 같고 末은 다르다” 소위 “本”은 문장의 공동 규율을 가리키고; “末”은 각체 문장의 특징을 가리킨다. 이런 사상으로써 문장의 류·체가 가진 특징적 인식에 적용하면 곧 이것은; 每一類 중에 모두 공동의 특징을 가지며, 같은 一類 중에 같지 않은 문체 사이에 또 그 차이가 있다. 그러나 무엇이 표준이 되어 분획이 되는가, 이에 대한 답안은 매우 많을 수 있다. 따로 《문심조룡·통변》의 말을 보면: “대개 문학의 양식은 일정하지만 창작의 갈래에는 일정한 방식이 없다.” 문체간의 관계가 상대적일 뿐 아니라 어떠한 일종 문체의 특징도 상대적으로 인정되어 있다. 이는 문체의 분획에 일정한 곤란한 부분을 가져왔다.

서방의 몇몇 학자들은 문장 분류 이론의 영향하에 있으며, 우리나라에서도 적지 않은 학자가 문장 분류의 새로운 탐색과 연구에 힘써서, 몇몇 학자들은 매우 가치 있는 견해를 제출했으나 진망도, 섭성도, 하면준, 장백장, 장수강 등과 같은 사람이다. 그들은 한 방면에서 일정 정도 우리의 문체 분류 전통을 계승하고 다른 방면에서는 서방의 이론을 흡수하여, 우리의 문체 분류 이론을 만들어 내는데 공헌했다. 그들은 자기의 분류를 부단히 수정하고 완전하도록 하였다. 이 몇몇의 이론은 현대 문장 분류에도 상당한 의의가 있으며 우리 고대 문장 분류 연구에도 또한 일정한 의의가 있다.

비록 우리의 문장 분류 문제가 비교적 복잡하나 많은 시간 탐색하고 학술계에 서도 어느 정도 문제의 해법을 찾으면 서서히 해결될 것이다. 나는 분류학적 일반 원칙 외에도 아래의 몇 가지 방안을 고려해야 한다고 생각한다.

1. 효용과 표현 방식 결합이 일어나야 할 것을 응당 고려해야 한다. 단일적 표준을 상용하여 분획하면 좋지 못한 해결의 문제가 발생할 수 있다.
2. 응당 다급 분류의 구분법을 채용해야 한다.
3. 우리의 문화 전통을 고려할 것을 요구하며 동시에 현대성을 필수적으로 요구하여 현대 중국 문장학 체계를 세우고 사람들이 각체 문장의 특징을 인식하는데 도움을 주고 규율을 복무코자 한다.
4. 충수를 많지 않게 해야 하고, 분류도 번거롭지 않아야 하며, 숙달이 용이해야 한다.

이상에서 선진시대의 문체 분류에서 중국 고대 문장 분류학까지 이야기했다. 내가 생각하기에 우리 나라 고대 문장 분류에는 하나의 비교적 명확한 사상이 있었으며, 한결같은 방법이 있어 선진 산문의 문체학 분류를 토론하면서 거듭 사용하였다는데 매우 의의가 있다. 선진 산문은 자연히 후대와 같지 않은 특징들이 많이 있다. 그러나 선진 산문의 정황과 문체의 분획을 완전히 살펴 就事論事의 구분법을 채용하면 의의가 없지 않을 것이다. 《상서》《일주서》《좌씨춘추》《국어》《전국책》과 제자서 중에는 모두 어느 정도는 본래 단편적 문장을 이루고 있으며 《무장정종》《문장유선》《문장변체》, 유우《문장정론》, 당순지《문편》, 종성《주문귀》, 하복징《문장변체회선》, 淸仁의 《고문연감》《고문관지》《고문사류찬》등 모두 적지 않은 선택을 하였다. 우리들이 만약 선진 산문의 진행과 문체학 연구에 대해 능하다면 선진 문학의 연구와 고대 문학 사상의 연구에 일정한 의의가 있을 것이다.